

缺失与误导

《21 世纪资本论》读书笔记

雅诺什·科尔奈

1. 引言^①

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21 世纪资本论》是部出色的著作，标志着一个跨越了数十年的极其重要的研究项目进入一个关键阶段，这项研究的发起主要归功于安东尼·阿特金森（Anthony Atkinson），多个国家的一流学者和研究团队在其中做出了重大贡献。^②该研究项目的目标是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下收入和财富分配的特点及长期趋势。

皮凯蒂的著作渗透着追求平等和团结的精神，他对穷人、被剥削者和弱势群体表现出了深刻的道德责任感。他的信念主要体现在该书的内容中，在叙述语气里也有所反映。他给人的印象不是一位枯燥的学者，而是被千百万人的遭遇所感染、为不劳而获的财富带来的奢华生活而愤怒的性情中人。

^① 笔者文责自负，感谢以下各位的宝贵建议：László Bakaesi、Zsuzsa Dániel、László Garai、Botond Kőszegi、István György Tóth、Emmanuel Saez、András Simonovits、Daniel Waldenström、许成钢以及 László Z. Karvalics。感谢 Réka Branyicki、Ádám Kerényi 和 Andrea Reményi 提供了高效率的研究助理工作，感谢 Brian McLean 提供了精确清晰的翻译服务。另外，感谢如下机构的大力支持：Corvinus University of Budapest、By Force of Thought Foundation 以及 ISC Foundation。

^② 参见 Atkinson（1997）。阿特金森等人的最新著作（Atkinson and Bourguignon，2015）以 2000 多页的篇幅总结了关于收入分配的经济学研究成果。

对于该书，目前至少已有 100 余篇评论，而本文的性质有所不同。评论意味着对一部作品的优点、不足或错误进行仔细的比较评估。^①本文则是执行一项更平凡的任务，正如文章副标题所示，我只是把自己在阅读该书时的某些思考简单记录下来。

皮凯蒂在他的导言中写道：“我属于在 1989 年时成年的一代人，正好赶上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纪念，也见证了柏林墙的倒塌。我属于在成长中听到过共产主义独裁者的各种新闻、却从未对那样的体制或国家有任何仰慕和怀念的一代人”。（Piketty, 2014, 第 31 页）

皮凯蒂的出生和成长遇到了好地方和好时候。在民主国家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生活，对他来说是自然而然的现实。我本人则完全不同。我已经历过七次可以视为制度变革的重大转型，政治组织形式或经济制度或两者同时发生剧烈改变。从 2010 年至今，第八次转型正在周围进行。对于我自己、同辈人以及有着相似职业生涯的同事而言，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经济并非理所当然的自然背景。因此在思考不平等这样的重大课题时，我习惯于采用把资本主义制度同社会主义制度加以比较的理论框架，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轨以及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轨中去寻求启示。从这个角度看，本文的思考方法会与皮凯蒂有根本的不同。我并不认为皮凯蒂和那些与之想法接近的学者希望建立一个类似于垮掉的苏东社会主义的制度。我知道他们主张建立一种更能被接受的资本主义制度，对此我们显然有共同点。在我看来，与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比较是一种值得推荐给他人的分析工具。把资本主义制度同其对立面放在一起，可以让人更鲜明、更清晰地感受到它的本质特征。研究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轨过程能起到类似的作用，因为它展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在现实中的表现，是一种活体实验过程，而非人为的模拟。很遗憾，皮凯蒂与其他许多西方学者没有采用过此类分析方法。

在阅读皮凯蒂的著作时，我不断自问，该书与马克思的《资本论》有怎

^① 较为全面和细致的分析可参考 Milanovic (2014)。许多出版物参与了有关皮凯蒂著作的讨论，在不同领域做出了贡献，包括：2014 number of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the fall 2015 number of *CESifo Forum*, the volum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reporting on the January 2015 conference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等。该书在匈牙利引起的评论包括如下作者的文章：Lajos Bokros、Péter Felcsuti、Péter Mihályi、Iván Szelényi 和 István György Tóth，以及 Ferenc Vicsek、Gábor Kuncze 与 György Surányi 的对话等。

样的联系。撰写本文时，我正好看到一个知名网站上刊登了一篇匈牙利文的评论《卡尔·马克思归来并重新撰写了〈资本论〉》(Karl Marx has returned and rewritten *Capital*, Losoncz, 2015)。该书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资本论》吗？拿起本书的人，无疑都会产生类似疑问。^①皮凯蒂是否给马克思的著作增添了一些他的时代不可能知道的材料？皮凯蒂是否解决了马克思未曾澄清的理论问题？该书给人的信号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确实影响了皮凯蒂的思考。而《资本论》对我的影响则毋庸置疑是巨大的，在19岁时，我就从头到尾逐字阅读了全书，并做了翔实的笔记。这一阅读经历对于我成为社会主义的信徒至关重要。多年之后，我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转而批评马克思的观点和现实政治主张，则是经过了令人震撼的历史阅历的结果(Kornai, 2009)。对我来说，以《21世纪资本论》命名的一本书立刻就会引发与马克思主义及其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描述有关的各种联想。

该书给许多读者带来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全面分析的期望，不止是因为其书名。其副标题表明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分配：“让分配问题重新回到经济学研究的中心”(Piketty, 2014, 第15页)。^②该书把某些规律和关系命名为资本主义的“第一基本定律”、“第二基本定律”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③这些强烈表述似乎都在做出承诺。但皮凯蒂的著作在让许多读者产生较高预期后，结果却远不能令人满足。找出他引发的这些过高期望以及随之而来的缺失感，将是本文必须探讨的主题之一。

某些评论者会探究为什么作者是针对某个特定课题，而非其他，然后就他们感兴趣的课题发表看法。本文并非沿用此类模式。我并不是抱怨皮凯蒂忽略了我和其他许多参与类似研究项目的学者所关注的问题。每个作者都有权聚焦

^① 不能认为皮凯蒂希望给大家这种印象，他的著作中没有此类陈述。或许是出版商为了市场宣传的需要而选择这一吸引眼球的书名。然而该书的导言中也没有任何语句能去除这种印象，资本一词在该书最初的法文版书名中是用小写形式出现(Piketty, 2013)，改变发生在英文版，资本(CAPITAL)一词的所有字母完全采用大写。该书的匈牙利文版(Pikett, 2015a)则是在主标题中对资本一词完全采用大写，其余的“21世纪”几个字采用较小的字体。

^② 皮凯蒂发表的总结该书主要观点的文章表达了同样的意思(Piketty, 2015b)：“把分配问题放回经济学研究的中心。”

^③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没有使用“基本定律”或“基本矛盾”的说法，这些术语是来自为普及马克思主义而设计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对于皮凯蒂的“基本定律”说法的批评，可参考Ray(2015)。

自己著作的主题，但也应该把讨论的边界告知读者。我所反对的是：过于严肃地看待皮凯蒂提出的宏大任务，并指望他很好地满足大家的期望。

收入与财富分配通过许多渠道同经济制度的其他方面交织，任何人如果想做详尽研究并与皮凯蒂展开争论，恐怕都需要写出同样体量的巨著。本文只是着眼于众多经济关系中的一个较小的子集：生产力在各方面的发展如何相互作用，主要涉及技术进步、不平等状况和经济行为人背后的激励机制等。当然，即使对这三者的相互作用，本文的分析也不够完善，省略了某些极为关键的分析，如产量的数量增长与福利国家制度的发展之间的联系等。

2. 生产力的发展，技术进步

力图理解资本主义本质的马克思把生产而非消费视为主要问题，这与他之前和之后的很多经济学家相同。我把自己也划归其中，这似乎是不证自明的选择。马克思作为一名科学家和政治家，关心生产力如何发展以及生产关系如何促进生产力的发展。^①他高度评价了资本主义制度对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而在此之前生产力长期处于停滞或缓慢增长状态。我想借用《共产党宣言》中的名言：“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Marx and Engels 1973 [1848]，第 85 页）然而马克思又坚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私人所有制与市场机制的统治，加上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府的行为）迟早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这正是资本主义必须被终结，然后以更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取而代之的原因。许多人对马克思存有误解。尽管他也高度关注道德问题，但他认为资本主义必须被取代的理由并不在于这个社会缺乏公正或道德沦丧，而是因为历史发展中的客观原因，因为它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必然会被淘汰。

马克思的预言已经被历史事实断然否定了。

^① 这里我是有意识地采用马克思的说法，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这些说法很容易转化为其他经济学派采用的术语。

反驳理由 1 生产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获得了更长足的进步。以 GDP 指标来看（皮凯蒂的著作也小心翼翼地采用了这个指标），马克思的预言并不成立。如果以 50 年平均数计，人均产值的增长达到了资本主义制度之前从未有过的水平：在长期中保持每年 1%—3% 的增长。这个速度并不显眼，但长期保持指数增长的结果相当惊人。没有任何理由认为生产力发展陷入停滞，遑论崩溃。

另外，GDP 时间序列只能部分反映生产力的发展成就。用黑格尔的术语来说，只能反映量变的内容。皮凯蒂的著作也深入讨论了数量上的增长（Piketty, 2014, 主要在 93—95 页），但这个指标以及皮凯蒂的总体思路都缺失了质变的内容。技术进步能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深刻的革命性改变，GDP 增长数据对此能告诉我们多少呢？用生产率这一常用指标来简单地描述进步显得过于狭隘，因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如果拿马克思时代的生活方式与今天做个对比，巨大的差异显而易见。没有哪种活动或人际交往方式不被技术进步彻底改造。以家庭生活为例，男女之间的劳动分工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会受到许多政治、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而技术进步无疑是其中最具分量的一种：家用电器、一次性尿布等发明大大简化了家务劳动；避孕技术深刻改变了男女之间、父亲和母亲之间的交往关系；手机和在线通话让家庭成员之间有了触手可得的通信工具；计算机让白领员工能在家里办公。另一个例子是休闲时间的安排，电视、智能手机、互联网、汽车和飞机的广泛使用，让人们的生活与过去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技术进步处于加速状态。从现实观察中得出的摩尔定律认为，技术进步或者说至少其中的部分进步可以用快速的指数增长轨迹来描述（Brock, 2006; Kurzweil, 2006）。最具活力的变化发生在所谓高技术产业、计算机世界或者说数字技术领域。变化的速度之快从计算机的进步中能得到最好的体现。让我们想想最早期的中央计算机，高技术产业的杰出创新者库兹韦尔（Kurzweil）曾回忆 1967 年用过的 IBM7094 计算机——当时他还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一名学生——并把其性能参数同 2004 年的笔记本电脑做了比较（Kurzweil, 2006, 第 102 页）。十年之后的比较对象则变成了智能手机。过去的“史前”计算机占据了一整个房间，而智能手机不过我们的手掌大小。早期的计算机售价惊人，以 2003 年价格计算高达 1100 万美元，而如今的优秀智能手机售价只有 400 美

元，不及前辈的 0.004%。同时机器性能的提高更是令人难以置信，处理器的运算速度提高了 7.3 万倍，存储能力提高了 12 万倍。^①高技术产业的指数化发展之猛烈，还可以用下面这种描述方式：在很长时期里，许多领域的性能实现翻番所需的平均时间只有 2 年左右。例如，处理器的运算速度，每过 1.8 年就是原来的 2 倍。

信息通信产业技术发展的影响并不局限于上述两个案例——家庭生活和休闲娱乐——而是扩展到所有维度的人类活动和人际交往上，改变了生产、流通和消费，改变了收入的过程和财富的变动，以及教育、科研和医疗等领域。零售业出现了新的交易形式——电子商业。技术进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全球化使金融交易的速度大大加快，并使金融产业的业务内容发生剧烈改变。各种社会活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军事进攻与防卫、犯罪与执法、取得政权和反抗政府、文化与文化垃圾、真知灼见与谣言谎话的传播等不胜枚举。

反驳理由 2 从技术进步的历史背景来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阻碍作用的说法并不成立。我撰写的有关资本主义的图书总结出了一个列表，包括从 1917 年俄国革命到 2010 年的 111 项革命性重大创新，从晶体管到互联网搜索引擎，从茶叶包到尼龙搭扣，从青霉素到核磁共振，从纸巾到 DVD，从超级市场到条形码等（Kornai, 2014, 第 6—9 页）^②，其中只有一项创新是首先在苏联出现并普及的，其他 110 项都诞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反驳理由 3 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轨时期的技术进步时间序列可以给我们启示。在制度改变之前，这些国家缓慢地借鉴或者偷师资本主义世界的革命性创新。而在制度改变之后，它们的借鉴速度显著加快。我选择了若干指标，针对欧盟的 15 个早期成员国，以及 10 个从社会主义转轨过来的新成员国，将转轨之前和最近的情况进行了比较。1995 年，老欧盟 15 国和新欧盟 10 国的互联网用户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分别为 3% 和 1%，到 2010 年则分别提高到 79% 和 70%。1995 年，老欧盟 15 国和新欧盟 10 国的移动电话普及率分别为 7% 和 2%，到 2012 年分别达到 127% 和 134%。1995 年，老欧盟 15 国和新欧盟 10 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所占比例分别为 16% 和 5%，到 2012 年分别为 13%

^① 这些比较所需的细节信息，可查阅我的主页：www.kornai-janos.hu/Kornai2015_background.pdf。

^② 该书（Kornai, 2014）和本文采用的通行做法是把某项创新的发现者或发明者，与最早实现大众化应用的人区别开来，后者才被称作创新者，他们往往不是最早的发现者或发明者。

和 11%。^①后社会主义国家在转轨之初对现代通信工具的使用远远落后于西欧，如今已在某些方面或多或少超越了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有的后社会主义国家也零星地出现了某些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革命意义的创新，如匈牙利的 Graphisoft 公司在建筑设计上的创新，Prezi 软件在教学和商业演示上的创新等。

技术进步是一把双刃剑。技术成果促进了贸易发展，让很多人的生活更为轻松，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利影响。某些新的危险后果严重，如恐怖分子可以利用互联网开展组织，从事反恐的政府安全机构也可能不加限制地窥探公民的生活（就像奥威尔小说中的老大哥）。这方面的讨论已经很多。我这里只想简单地指出，在对资本主义制度做价值判断时，应该把技术进步在各方面的影响都考虑进来。

读者们如果到皮凯蒂的著作中去寻找对资本主义的总体刻画，了解马克思所描述的 19 世纪资本主义与 21 世纪之间的差异，会强烈感受到书中不够重视、甚至完全忽略了技术进步以及生活方式的相应变化。该书确实包含涉及技术进步的内容，但对其重要性没有充分展开讨论。这里有个例子来说明我所讲的“忽略”。皮凯蒂积极参与了有关谷歌公司的讨论：“如果某家公司或某个人给经济中其他参与者贡献的边际收益确实大于其收取的产品价格，那么少缴些税款甚至获得补贴是完全合理的，经济学家们将这种现象称为正外部性。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每个人都会出于自利声称给其他人带来了重大的正外部效应。谷歌公司当然也没有提供最起码的证据来证明它确实做出了那样的贡献”（Piketty, 2014, 第 650—651 页）。上述论断令人吃惊。有人把最近几个世纪的文明史在信息维度上划分为古腾堡时代（印刷术创新的出现和普及）与谷歌时代（可以从互联网上获得便利开放的信息）。我们仍处在第二个时代的开端，越来越多的人正习惯于用智能手机来“google”他们马上需要的信息。这是个革命性的飞跃，产生了数不清的外溢效应，对于有如此广泛权重的外部性谁能用金钱来准确测算？^②有关谷歌这个企业帝国在世界各国如何缴纳税收的情况，我不做评论，那应该是参与谈判的律师、竞争监管机构、税务部

^① 参见 Kornai (2014, 第 28 页)。该列表是由 Réka Branyiczki 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 (World Bank, 2015) 增补更新而来。有关后社会主义国家转轨时期技术进步的背景资料和其他数据，可查阅我的主页：www.kornai-janos.hu/Kornai2015_background.pdf。

^② 谷歌公司给广大用户提供了无数次的免费服务，它的利润来自其他方面，主要是广告收入，而这些广告很多时候会在真实搜索信息之外加入误导性的指示。

门和法院来决定的事情。可是让我吃惊的是，皮凯蒂那么轻易地就断言，谷歌公司产生的正外部性除了该公司自己的供词之外就没有其他证据了。

3. 不平等的多个维度：财富的来源

不平等的多个维度

在道德与政治哲学上，我与皮凯蒂一样支持人们之间的平等和社会正义原则，我也接受他对这些原则的重要性的论证方式。有关平等原则在自由主义世界观中的地位，可参考罗尔斯等学者的论著（Rawls, 1971; Sen, 1985; János Kis, 2009 a, b, 2014）。下面的评论将讨论分配问题以及其中涉及的平等和不平等问题，但不是基于哲学的理论架构，而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

在探讨资本主义制度的分配问题时，与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比较并将脱离社会主义的转轨历史结合进来，同样能有所助益。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有许多差异，在不同时期的做法也各不相同，但这里开展的比较研究不涉及其中的细节。

皮凯蒂的著作聚焦于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分配上，其中又重点关注来自资本的收入和对财富的占有，尤其是顶层 1% 人群的资本收入以及豪富阶层的财富状况。尽管这些内容确实重要，可是我们在思考此类问题时必须记住不平等是个多维度的现象。让我们先看看其中的几个维度，暂时不考虑这些内容是否全面，也撇开其相对重要性。

(1) 先从皮凯蒂特别关心的现象谈起：一个国家的货币收入和财富的分配。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从“最后的斗争”开始，使剥夺者被剥夺（Marx, 1906, 第 837 页）。一定规模以上的私人所有制生产企业和住房被国有化，大规模的种植园首先分配给农民，然后把农民的私有财产变成集体所有制（如苏联的集体农场、中国的人民公社、匈牙利的生产合作社等）。财产关系的这种改造是通过暴力完成的，许多人因之丧命，或被遣送到劳改营。

此类平等主义改造的景象令人震惊，穷人搬进富丽的宫殿，占据了富人在城里的公寓。企业控制权从高收入经理人转移给执政党委派的工人代表。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曾经身着统一的毛式制服，就是这种平等主义的极端案例。

然而执政党很快放弃了这种形式上的平等。工资差异不但允许，而且是必要的激励，从事较为艰苦的工作、需要更高技能的工作，或担负额外职责的工作（如党委书记）将得到更高的待遇。可是即使有这些差异，社会主义在货

币收入上的不平等程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不平等程度仍然不可比拟^①（参见 Atkinson and Micklewright, 1992）。

前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没有大量私人财富的积累。高层党政领导、大企业管理者或者秘密警察头子可以乘坐配司机的专车，住进宽敞的国有公寓，但如果失宠，这些物质特权享受就会随之消失。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可能依靠私人继承财富的收入为生。真正的障碍其实还不在于此，而是官方意识形态及植根其上的法律规范的严令禁止。社会主义不会容许“寄生虫”式的生活方式，劳动是必需的。在警察的检查中，任何不能提供工作单位证明的人都会被当作对公众有害的懒汉加以惩处。靠施舍为生同样不可能，乞讨被法律所禁止。人们必须工作，所有体格健全的人也都能找到工作。唯一的例外是没有工作能力的人，他们将获得政府的福利保障。^②

出于道德原因而强烈主张大幅减少货币收入和私人财富差距的人们，从这个视角上可能会被社会主义制度所吸引。该制度的基本特征——近乎完全取消私人所有制和市场机制——必然导致平等主义的倾向。正是这种倾向让生活冷战铁幕西侧的许多左翼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执政国家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向往。

这一维度的不平等状况在 1989—1990 年开始的制度转轨后发生了巨大改变。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货币收入不平等程度在较短时期内迅速扩大，私人财富大量积累起来。关于豪富阶层的财富来源，有很多资料可以参考（如 Flannery, 2014; Hoffman, 2002; Kolosi and Szelényi, 2010; Laki and Szalai, 2004, 2011, 2013）。虽然各国的历史背景、政府组织形式、政党的力量对比，以及对私有化和市场化的实施政策互有差异，但在所有国家，穷人与富人的差距都在拉大，特别是最底层与最富有阶层的差距，其中几个国家的贫富差距甚至达到极为严重的程度。^③新兴富豪阶层的第二代的代表也很快出现，他们依靠父母的收入和财富，

① 后来，随着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引入了某些市场机制的要素，货币收入差距有所扩大。这也是 1960 年代的西方新左派对东欧国家的改革措施感到怀疑和厌恶的一个原因。

② 各国在不同时期给孕妇、幼儿母亲、病人和残疾人设计的工作、休假和福利安排各不相同。本文不涉及政府规则的各种细节，只是概括地介绍最主要和最普遍的原则和做法。

③ 对较为长期的转轨过程中的收入不平等趋势的历史分析，可参考 Tóth (2014)。该研究发现加入欧盟的后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平等扩大速度有异质性特征，捷克、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的不平等程度几乎没有变化，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则严重扩大。在匈牙利、保加利亚和立陶宛等国，某些时期出现了不平等程度缩小的现象（Tóth and Medgyesi, 2011）。俄罗斯和中国的扩大速度引人注目。

不需要自己的努力就过着名车豪宅的享乐生活。

随着新制度的基本属性——私有制和市场的主导地位——逐步确立，似乎出现了一种内在的发展趋势：货币收入以及可以用货币代表的财富分配的巨大差距。后社会主义转轨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证据，表明这种强烈趋势是资本主义固有的主要特征之一。从历史视角来看这种转轨是以闪电般的速度完成的，使资本主义的这一面貌极为突兀地暴露出来。某些后社会主义国家对私有化和市场化的处理较为谨慎，但仍不能抑制收入和财富差距扩大的系统倾向。资本主义制度最丑陋的一面在各国都展露无遗。

(2) 产品和服务的可及性也是不平等的一个重要维度。社会主义经济的一大特征在于长期短缺，买方对符合自己需要的产品和服务有购买力，但缺乏供给。在这个维度上存在巨大的不平等。普通工人与党委书记的生活水平的最大差异不在于他们的工资，而是他们能否获得短缺商品。国家就业等级中地位最低的人住在非常寒碜的廉租房里，因为这是给他们安排的分配结果。许多家庭虽然有足够的工资可以租下自己的专有住房，却必须与他人共用。人们在权力金字塔中的地位越高，分配到的住房就越大越舒适。决定一个人或一个家庭能否安装电话，能否购买进口的稀缺商品，能否出国旅行的因素，不是他们的货币支付能力，而是政治、社会和经济地位。有人为购买私人汽车需要花好多年时间排队，掌握特权的人则可以例外。特权划分为多个等级，不是根据收入，而是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如所处的地位、与上司的交往、效劳的意向、纪律和逢迎等。职业技能当然也在工作生涯中发挥着作用，但政治忠诚度更为关键。

在这个维度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则是奉行平等主义：不管花钱的人是穷是富，货币都有着同样的购买力。以我的价值体系看，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优点。很快，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轨就带来了这个维度的平等，短缺经济结束了，供给约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约束是需求方的买方支付能力，于是就回到上一个维度：货币收入的不平等。

(3) 在不平等的众多维度中，让愿意工作的人有机会找到工作、并得到同工同酬的待遇是最重要的之一。

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特征是产品和服务市场上存在普遍、严重和长期的短缺，这给买方带来很大麻烦。同时部分由于类似的原因，较为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存在严重和长期的劳动力短缺，给雇主也就是公有企业的管理者带来了

很大麻烦，而增强了雇员的地位。他们知道如果跟现在的老板发生冲突，会很容易找到其他的工作，这增强了他们的职业安全感。

在制度转轨后，劳动力市场从需求过剩转向供给过剩状态。大规模失业出现了，劳动参与率迅速降低。第一次剧烈创伤是在“转轨危机”中感受到的，但在危机结束后，社会主义时代所常见的劳动力短缺现象也没有再现。借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说法，从此之后长期维持着“产业后备军”，劳动力短缺所带来的安全感不复存在了。失业劳动力以及放弃或者从未尝试寻找工作的潜在劳动力的规模和比例，在各国互有不同，在各国内部也由于市场状况和移民进出的起伏而存在时间变化。然而，这种现象在所有资本主义经济体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属于制度的内在特征，它不但给直接受到影响的人带来严重的损失和羞辱，也影响到拥有工作的人，让他们时刻感受到失业的风险和焦虑。

在皮凯蒂集中关心的货币收入分配的统计数据上，尤其是他的理论分析上，这种现象只得到了部分的反映。读者们期待他的著作能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特征有全面分析，而皮凯蒂本人又高度关注平等问题，他对就业问题缺乏重视，实在是令人遗憾。

(4) 各种类型的歧视现象是不平等问题中值得关心的一个特殊维度。从收入和财富分配的现有统计数据中，不可能分辨出男人和女人、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主体教派和少数教派、同性恋者和其他性取向者受到不同待遇的频率或程度，类似的歧视标准还可以有很多。歧视可能体现在就业机会不平等（与上述的第三个维度相关）和其他许多选拔过程中。被歧视群体的成员可能在职业生涯中受阻，在学业中受限，更难以获得住房，或者被排除在社会交往之外等。

与马克思的时代相比，这个维度的许多限制已被改变。许多国家的情况有所改善，但任何国家都远未能充分解决问题。另外世界上还有广大地区没有取得多少进步，歧视现象甚至更为严重。皮凯蒂的著作对这一重要的不平等维度几乎没有涉及。

(5) 政府提供的服务与货币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在许多方面存在联系，但仍然应该从单独的维度来关注这方面的内容。对于“福利国家”的概念没有普遍接受的严格定义，但这个词依然最能代表本维度所包含的各种现象。在这方面，各国也存在巨大差异，有不同的变化在各自发生。不同政党、意识形态和经济学派别，对福利国家应包含的内容以及如何实现，存在很大分歧。关于

细节的争论更多，如养老金体制、医疗服务、政府负担儿童看护成本、向受助者提供的政府福利的规模和手段等。可是我们不能否认，福利国家的作用无处不在，而且极大地影响着社会不同阶层和人群的生活水平。福利国家与货币收入和财富的分配通过多种机制存在联系，强化或弱化了其影响力。借用数学意义上的空间一词来说，上述的第1到第5维度的不平等现象是发生在不同的空间中，其影响必须用不同的单位来度量。这些内容在皮凯蒂的著作中都被反复提到，但就重视程度而言，远远比不上货币分配的不平等。

(6) 我把知识和信息的普及程度也视为单独的维度。儿童或年轻人从家庭获得的知识体系以及他们的学习方法，都同家庭收入与财富有强烈关联。不过其他因素也在发挥作用，如特定的教育制度，包括教育经费的来源（学费、奖学金、学生贷款等），还有支持弱势群体的平权行动等。在现实中，除了极端的机会不平等和过头的平等主义外，还有大量的中间案例。

社会主义制度在提供中小学免费义务教育方面行动极为迅速。高等教育也实行免费，但得到的资源配置远不及能快速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的其他部门。只有少数年轻人可以接受大专院校的高等教育。在这些国家的党国体制建立初期，教育部门往往利用名额制度根据社会背景进行公开歧视，来自工农家庭的年轻人受到优待，来自资产阶级或贵族家庭的人则很难获得高等教育机会。

这里我又要提到与技术进步的关系。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给全社会带来了推动平等主义的高潮。当然我并不认为，匈牙利东部吉卜赛贫民区长大的儿童有着与布达佩斯的高知家庭的儿童相似的受教育机会。大公司的执行董事也显然比工厂里的非熟练工人拥有更多的信息获取渠道。然而在这个维度上，我们距离机会平等要比其他维度近得多。没有人被排除在电子邮件地址和收件箱之外，迟早有一天全世界的年轻人都能拥有计算机和智能手机，以及未来出现的更高级的产品。掌握这些产品的技能越来越依赖于自己的天赋。于是一种新的不平等因素也现身了：年龄。年龄较大的人，哪怕是富人和很有教养的人，在掌握这些产品方面经常远不及还在上小学的自己的孙子或者来自穷人家的孩子。

从长期来看，利用高技术产品的能力与人们的收入和财富肯定存在正相关，但这种关联并不很强。在这个维度上的顶层的百分之一人群掌握的支配权，比之前几个维度上的弱很多。

我提到了六个维度，或者说六组维度、六组现象，其中每个现象还可以划

分出几个不同的维度。皮凯蒂显然了解这些领域的研究及其重要性，他在概括其著作主旨的一篇短文中承认自己打算撰写关于资本和不平等的多维度历史 (Piketty, 2015b)。可是，他书中的内容比例似乎没有反映出这样的意图。该书的大多数篇幅集中在第 1 个维度上，核心理论是资本收入与增长率之间的差距。其他某些维度有所论述，某些则没有提及。全书没有任何独立章节是针对以上的第 2 到第 6 个维度的任何现象。另外一个突出标志是，与这些维度有关的词汇也没有出现在详尽的词汇索引中。

我要重复一下本文引言中的说法：写哪些内容与不写哪些内容，完全是作者的自由。对皮凯蒂的著作之所以产生强烈的缺失感，是因为我希望从该书中看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面分析，以及包含在其中的对分配的分析。这种期望由于作者所倡导的价值观而被强化，尤其是他极为关注的高尚的平等观念。对于一位如此崇尚平等的作者，其代表作怎么能忽略有关平等的那些关键维度呢？

获取巨额财富的途径

皮凯蒂的著作对财富的着墨远多于贫困。但在选择这一焦点之后，他却很少谈及一个非常重要（而我认为极富研究和道德意义）的问题：每个富人的财富是如何而来，各种致富的方法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1) 在最富有的人群中，我们能发现以革命性创新而出名的大人物。每年由《福布斯》杂志编写的“《福布斯》400”排行榜是众所周知的全美国 400 名顶级富豪的名单。^①其中包括一些因为革命性创新而跻身其中的个人或企业：比尔·盖茨，第 1 名，视窗操作系统，微软公司；拉里·埃里森，第 3 名，大数据管理，甲骨文公司；迈克尔·布隆伯格，第 8 名，布隆伯格商业信息终端；马克·扎克伯格，第 11 名，脸书公司；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第 13 和第 14 名，互联网搜索引擎，谷歌公司；杰弗里·贝佐斯，第 15 名，互联网图书销售，亚马逊公司……还有其他很多人。

在前文中，我提到革命性创新的产生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本质特征。许多此类创新是在理论上所说的寡头竞争或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诞生的，创新在竞

^① 对《福布斯》排行榜可以从多个维度进行细致分析 (Kaplan and Rauh, 2013 a, b)。本文提到的一些人名来自卡普兰等人的研究、《福布斯》杂志编辑们的研究，以及我的同事 Ádám Kerényi 的分析（该分析以及其他背景资料，可以参考我的主页：www.kornai-janos.hu/Kornai2015_background.pdf）。这里的数据主要是基于 2014 年的《福布斯》400 排行榜。

争中出现，然后一度占据近乎垄断的地位，通常是利用专利的保护。这种地位形成的高价格，给创新企业及其股东（很多情况下还有高级经理人）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回报。当专利保护到期后，这种特殊地位通常会走向终结。其他企业将开始借用其创新成果，产品售价不再能带来额外的利润。或者原来的创新会被其他创新所超越。

通过技术进步而积累大量财富的故事可能会有不同的结局。取得某项技术突破之后，后来的创新和发展可能会减少。所有使用计算机或智能手机的人则都能感受到，谷歌、微软和苹果公司的业务领域在逐步扩展，其股东的财富在不断增长。而其他一些人在取得重大技术进步后不是依靠继续创新来增加财富，而是通过成功的财务投资。还有人虽然能长期维持优越的生活，却不能跟上竞争对手的步伐，从顶级富豪的排行中被淘汰。但不管怎样，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至少有某个时点，他们的生活、财富同取得的技术成就是相称的。

我不想只从一个角度刻画这群人的形象。许多处于准垄断地位的创新巨头与竞争对手、本国或国际的竞争监管机构存在法律纠纷，被合理或不合理地指控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过程——资本主义制度最重要的伴生品之一——会时不时地从人群中选拔出最具效率的成功企业家，将其他人击败。（这方面的理论可以参考 Aghion and Howitt, 1998; Aghion et al., 2005; Stiglitz and Greenwald, 2014.）

（2）豪富人群中的另一个组别是大公司的高收入经理人。他们的名字与历史上的重大技术进步无关，但其领导的企业只有不断开发产品才能持续获得成功。管理这样的大型企业需要各方面的能力。产品的不断细分增加了生活各领域的复杂性，全球化时代的大企业的行动跨越了各国的边界，这些增强了对极有天赋的经理人的需求（关于生产复杂性的增加对经理人薪酬的影响，可参见 Hengartner, 2006）。在这样的市场上，供给方地位加强，使他们的收入推高。我们可以对那些天价高薪厌恶地摇头，但事实如此，当企业搜寻合适的首席执行官人选时，那些人在这个细分劳动力市场上确实值很多钱。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止有固定收入和基于公司业绩的奖金，而且有若干免费或价格很低的公司股票期权，使他们与公司的关系不止是作为雇员，同时也成为股东。

大企业负责人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他们也很清楚自己的职位未必牢固，如果业绩达不到预期迟早会被解雇，给生活造成冲击。但那时他们可能已

积攒下了足够的财富，足以在余生继续跻身极为富有的人群。此外，如果从这种大公司离职，他们的工作合同还可能提供优厚的遣散费。

有关公司经理人的薪酬变化趋势目前已有大量的实证研究 [相关文献综述可参考 Kaplan and Rauh (2013 a, b), Mehran (1995), Murphy (1999), Piketty and Saez (2013) 等]。研究表明这样的薪酬并非完全由劳动力市场的通行机制决定，而是同时受到股东与高级经理人之间的特定权力关系，以及其他经济和社会因素的影响。这在后文讨论的激励问题中还将有所提及。但我们可以认为，许多经理人的薪酬增长是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直接相关的。

(3) 豪富人群中包含金融产业的某些大人物，如沃伦·巴菲特，第 2 名，乔治·索罗斯，第 17 名等。位列第 50 名的托马斯·彼得菲可以归入此类，也可以因为他对高频证券交易的创造性贡献而归入创新者的行列。我将金融业作为独特的群体，不止是由于该产业在经济和法律上与其他产业有差异，而且因为公众们对“银行家”们的收入与财富的看法不同于对“产业家”们的看法。历史数据显示，金融业在经济中的分量长期以来持续增长。商业联系的复杂性增加，经济参与者在国内外的触角延伸，以及交易速度的大大提升——这些都与技术进步密切相关——造成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出现跳跃式的增长，促进了金融业高层经理人的报酬提高。

某些媒体从业者把这个致富人群美誉为“投资者”，其他人则不客气地说成“投机客”。金融家们的许多活动显然满足了社会需求，个人和机构（如退休基金）需要使自己的储蓄维持购买力，金融产业还在协调储蓄和实物投资之间的关系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当然，这些投资者或投机客给他们自己及其客户挣了多少利润，高风险的金融业务又造成了多少伤害，则是另外的问题。合理的或者说至少合法的交易，与有害的甚至涉及诉讼的交易之间的界限到底该如何划定？金融学家、律师乃至负责监管法规的政治家们对此并没有统一的意见。

本文的任务不是探讨这个界限的位置，但我肯定不赞同把投资人或投机客的行为一概视为无效和有害、主张占领华尔街、关闭金融交易的观点。除其他理由以外，我表示不赞同是因为自己知道分散化投资决策的优势。在我经历过的中央计划体制中，少数党政高层领导就能决定把国民收入的多大部分用于投资，用于哪些重大项目，甚至包括投资的资源配置的细枝末节。没有人能要求

他们对自己的决策效果负责，因为效果没有进行测算甚至无法测算。资本主义金融产业的豪富投资人或投机客所积攒的财富，远远比不上中央计划决策的重大失误造成的损失。

(4) 在豪富人群中还有各种明星人物，来自企业界之外的其他社会领域，包括知名电影导演乔治·卢卡斯（第 114 名）和斯蒂芬·斯皮尔伯格（第 151 名），拥有自己的传媒公司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第 190 名）。传奇篮球明星迈克尔·乔丹没入围 400 强，落在福布斯富豪榜的 1741 名。

明星这个说法早已超越了好莱坞和体育馆的范围，如今有明星律师、明星新闻编导、明星记者、明星医生甚至明星学者，他们通过职业活动获取了丰厚报酬。经济学界也有明星，那些人除了大学的工资外，还通过畅销教科书和其他图书版税、学术圈外的演讲费以及大公司的董事或顾问津贴来挣钱。

以经济学家的视角来看，此类现象毫不令人吃惊。体育俱乐部可以把比赛转播权卖给某些电视台，如果队中有大牌球员，观众人数和广告收入将随之增加，所以俱乐部向明星球员支付巨额薪水是值得的。竞技运动的盈利能力大幅提高与技术进步有关，精彩的比赛不但能在体育场观看，而且还有千百万人通过电视机、电脑和手机欣赏。希望增加诉讼获胜概率的客户们可以自由选择明星律师，律师的高价对他们来说是物有所值。但本文并不是回答明星们的天价收入是否合理的问题，关于哪些人是不朽的电影演员和导演，或许电影史学家们会有后见之明，其结果或许不同于当前收入最高的演员和导演。在法官和法律学家中，肯定有许多人的法律素养比明星律师更高。这种现象与社会的不同分区有关，在市场机制发挥主导作用的职业领域，人们的收入总是会发生分化，不可避免会出现顶层的百分之五和百分之一。而社会主义制度与之不同，苏联的有关机构曾经同西方的乐团经理就小提琴家大卫·奥伊斯特拉赫和钢琴家斯维阿斯拉夫·里赫特的演出进行谈判，索要巨额出场费。但如此高的报酬对苏联国民来说显得过高了，于是大多数报酬被政府拿走，演出者只得到一小部分，使其收入同其他受过高等教育的国民相差并不悬殊。

以上的讨论主要是针对较为公平，或者更谨慎地说是通过合法手段获得的高收入，当然不能认为所有的高收入都适用上面的评论。

(5) 有相当比例的高收入没有体现在税收或者家庭统计调查中，是属于

逃税的灰色经济或者黑色经济。^①某些巨额财富也没有纳入统计，例如向税收天堂转移的财产。税收欺诈如果被揭露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6) 世界各国存在不同程度的腐败现象。某些企业家利用向官员行贿，在竞逐政府合同时占据不正当的优势。这些绝非小事，而是关系到大型项目、军事采购，以及修建公路或其他重大设施的政府决策。负责分配政府资金的人可能暗中作为项目申请人的合作伙伴。政治倾向也可能发挥重要作用，“我们扶持你的生意，你给我们的党派和竞选活动提供捐助”。此类政治好处不限于政府合同的安排，以及裙带主义和贿赂，还可能表现为价格规制、特定的税收规则制定、给亏损企业或其他机构的政府补贴，以及是否救助困难企业的决策等。

马克思满腔义愤地描写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过程，这在 1989—1990 年的后社会主义国家也出现了，大部分国有资产被抛进私有化进程。某些财产转移是采取诚实的做法，例如，新的股东按照公平的价格和条件购买国有资产。但欺诈广泛存在，决策者把大量资产以极低价格转移给政治或商业上的亲信。通过这些渠道，前苏联各国、中国以及中东欧国家出现了一些白手起家的寡头，其中某些人甚至跻身全球富豪榜。

(7) 有一段时期，庞氏骗局的操纵者也会加入顶级富豪的行列。其中大多数人最终会身败名裂，却阻挡不住其他人继续尝试这种骗局。

(8) 黑手党家族也能聚集大量财富。其中许多采用暴力甚至谋杀的手段来争夺博彩业的支配地位，乃至掌控整个地下赌博产业。

下文将涉及继承财富的问题，在此我要对上述的豪富来源划分再做一点评论。读者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我远不接受对资本主义的不平等状况的精英主义解释，我并不认为富人的财富都是合理的，而穷人的命运本该如此。对巨额财富的深入分析需要严格区分不同的财富获取途径。皮凯蒂正确地指出了经济学不仅仅是做客观的测算，而同样是伦理学 (Piketty, 2015c)。在以上对于财富来源的论述中，我根据自己的价值观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次序，从尊敬，到不赞同和反感，再到蔑视和谴责。按照我的价值观，看到金钱从纳税人手中通过政治扶持或贿赂转移给某些私人，或者看到政治势力为寡头利益服务，带

^① 要说的是，看不见的逃税情况在收入分配的中下层也很常见，并不仅限于上层收入者。这也扭曲了分配数据。

来的愤怒远远超出听到企业高级经理人或体育明星获得数百万元高薪的报道。我的道德准则不允许我对某些人群、某些阶级或阶层做出不加区别的总体谴责，这个态度也适用于对豪富阶层的道德判断。

继承财富

皮凯蒂的数据指出，从先人那里继承的财富所产生的收入占比在增加。这确实值得引起密切关注。但在我看来，这里同样缺乏微观层面的分析。通过个人努力获得财富与通过继承获得的财富在很多时候可能会混在一起。福布斯排行榜的编辑们引入了一个特殊的测量指标：自我致富成就，分值从1到10 (Fontevvecchia, 2014)。分值1代表“衔着银汤勺出生”的人，分值9代表每分钱都是自己奋斗所得的人，如出身洗碗工、后来实现了美国梦的百万富翁。分值10与9的区别是，获得成功的人曾面临特定的不利环境，如奥普拉·温弗瑞作为非洲裔或亚洲裔出身的媒体明星所面临的种族歧视等。

对于跻身福布斯排行榜的人的自我成就分值的分布，有人针对其中最富裕的人群做了全面的分析，即2012—2014年至少有一次进入前50名的人群。结果发现大多数人的自我成就分值都高于6，其中31位是属于最高的类型：9—10分。

自己完全不做什么工作，而是仅靠继承财富而跻身排行榜前列的人数量很少。然而我们能看到排行榜中有不少继承人是在负责家族的产业，并为其做出了贡献。强生公司是真正革命性的创新者，非常成功地推广了他们的急救绷带和其他产品。^①该公司的主要股东和首席执行官在许多代人中都是来自约翰逊家族，他们在福布斯美国家族财富榜中位列第46名，阿比盖尔·约翰逊和爱德华三世·约翰逊则在个人排行榜中分别位列第36名和第65名。^②

皮凯蒂著作中引用的文学名著语句令人难忘，如简·奥斯丁和巴尔扎克小说中的角色的所做所想，能帮助我们理解某些问题。我想谈谈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家族》，这个北德意志的最富有上层家族之一在前两代人中通过诚实的商业活动积累了大量财富，故事是讲第三代的情况。其中一个兄弟负责贸易公司的财富和经营，希望继承家族传统。另一个兄弟缺乏经商才干，也没

^① 强生公司的某些产品在匈牙利的药店里非常有名，例如：Bengay、Immodium、Listerine、Nicorette、Nizoral 和 Tylenol 等。

^② 当然还没有精确测算一家企业的成功里面，有多少是来自继承财富的贡献，有多少是每一代人的努力、才华和幸运的贡献。

有努力尝试。这样的家族史是典型的谈家族财富的勤奋创造者和挥霍财富的懒汉的故事，在创造时代过去之后，后代大肆挥霍。

布登勃洛克家族早期的目标是把尽可能多的财富转交到下一代手里，这关系到皮凯蒂著作中多次提到的一个问题：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股东和经理人只关心短期利润，只希望拉高股票的当前价格，那么谁来关心社会的长期发展呢？在民主国家，当政的政治势力希望通过受欢迎的政策措施来增加连任的几率，政治家们的思考中也不够重视长期利益。^①在这样的环境下，布登勃洛克模式成为能促进长期利益的所有权结构，这个模式希望把家族财富、企业文化和正直精神至少能在几代人中传承下去。我知道不能指望这种模式长期延续，但它仍值得思考，因为在继承受到普遍攻击的时期，这至少证明继承的愿望可以带来对社会有益的激励。

某些富人把部分收入或财富捐献出来用于公共目的，其中包括给有需要的人或群体提供帮助，支持医疗、教育、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等。此类捐助有多种形式，从直接向受助者个人付款到建立慈善基金会等。许多人把遗产捐献给自己或其他人建立的基金会。对继承问题的这种善意解决办法尊重了积累财富的人的处置意愿，发扬了无私精神，并且在我看来尤其重要的意义还包括打破了由父爱型政府来决定谁在再分配中获益的垄断地位。

此处有必要引用比尔·盖茨在讨论皮凯蒂著作时的言论（Bill Gates, 2015），“设想有三个不同类型的富人，其中一个把资本用于发展自己的产业，另外一个把大多数财富用于慈善，第三个则主要用于消费，购买游艇和飞机等。的确，这三个人的财富都造成了严重的不平等，但我认为前两人给社会创造的价值显然大于第三个人。希望皮凯蒂能注意到这样的差别……”

4. 激励

经济思想史上的逸闻

马克思坚信，资本主义制度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而彻底摆脱了私人所有制、市场和人们的自私本能束缚的共产主义制度，则会消灭生产力发展的所有

^① 当年开展有关社会主义的理论讨论时，有人认为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只关注短期利益，废除私有制可以带来更为明智、更有前瞻性的中央计划经济。然而，实践表明中央计划也只关注短期目标，如发挥军事潜力或者促进增长率（这简直成了一种迷信）等。社会主义留下的遗产往往是巨大的环境破坏和严重缺乏保养维护的公有资产。

障碍。包括代表作《资本论》在内的马克思的著作，都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即对人性的错误判断。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入理解，必须通过对激励问题的透彻研究才能做到。马克思的《资本论》忽略了这点，皮凯蒂的著作也出现了同样的缺失。

1930年代发生过一场有关社会主义经济的著名争论。起因是当时生活在美国的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的一项研究（Lange, 1968 [1936—1937]），他的模型似乎表明，以公有制企业和中央计划价格体制为特征的经济体可以实现供需平衡，并保证有效率的资源利用。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几本书则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护，尤其关键的是私人所有制能产生天然的激励。利用一切可能的知识和信息，抓住商业机会，符合私人所有者自身的利益（Hayek, 1935；Mises, 1920）。熊彼特对激励理论做了补充，把企业家视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推动者，他们会努力寻找新的资源组合方式，尝试新的组织形式，占领新的市场（Schumpeter, 2008 [1934]）。鲍莫尔等人对资本主义的不同形式做了归类整理（Baumol、Litan and Schramm, 2007），认为“创新资本主义”（entrepreneurial capitalism）对推动社会进步尤其成功：“生产创新所需要的激励以及对奖励回报的保障，必须得到维持和加强”（第234页）。

近期的大多数经济学研究把激励的概念缩小到委托—代理关系上：委托人希望鼓励代理人为前者的利益服务。本文是从更宽广的视角来看激励，首先思考是什么原因导致人们不为委托人服务或者不受委托人的影响？私人所有者、企业家、创业项目的发起人或者新企业的创始人面临怎样的激励？利润的驱动力有哪些？当然这可能也涉及股东所雇佣的高级经理人的激励，我的讨论也包括，如果经理人以接受股份作为激励工具，他们的角色就与所有者存在一定的重合。

在研究激励问题时，我们还需要关注利率对储蓄和投资意向的影响，它们涉及某些关联关系是经济政策制定者熟悉的内容，也是宏观经济学和增长理论领域的学者的研究对象。增长率主要取决于储蓄率和投资率，在低速增长的经济体执行强大的再分配政策，处于收入分配底层的人们的境遇有可能改善。而如果分配模式能促进更多投资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他们的境遇同样能得到改善。很自然，两条主要行动路线存在某些结合的可能。这条因果链——利率产生激励→影响储蓄和消费→影响增长率→影响消费（包括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尽管极为重要，却没有在皮凯蒂的著作中做深入讨论。他把利率放

到各种类型的资本回报之中，也没有与利润进行区分。出于篇幅限制，对这一激励问题我不再从宏观经济学上加以赘述，而是仅从微观经济学（以及微观社会学和微观心理学）的角度来讨论。

经济学文献对激励问题有广泛研究。作为高水平的经济学家，皮凯蒂当然也熟知这个课题的内容。他在著作中忽略这个课题不是由于浅薄无知，而是因为他的视角：不平等可以展开研究和讨论，而把激励问题通过假设抽象掉了。^①但我认为这是个不能接受的简化，它对研究的限制会导致错误的理论和政策结论。

三组现象之间的关联

世界知名的匈牙利足球明星费伦茨·普斯卡什说，“小钱小足球，大钱大足球”。^②此话看似琐碎，却很能印证本节希望表达的观点。

我们来看看三组现象之间的关联：（1）业绩（在业绩的不同表现形式中，首先是创新和技术进步）；（2）促使人们付出努力的激励；（3）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这三者之间存在多维度的相互作用，下面只涉及其中的一些。

（1）激励→业绩。许多研究证实，这个关联可以用数字来表述和测量（如 Jensen and Murphy, 1990; Prendergast, 1999）。墨菲的研究测算了美国企业的股票价格上涨会在多大程度上提高首席执行官的货币收入，他称其为“薪酬—业绩敏感度”，并发现在 1972—1996 年间存在上升趋势（Murphy, 1999, 第 2560 页）。该研究与皮凯蒂的结论有关，但我认为可以给这个实证发现提供一种不同的理论解释。大多数企业高管的薪酬是由多个因素决定，一个因素在于股权是集中还是分散，股权越分散，高管人员越容易得到高薪。股权关系正好表现出这样的趋势，造成高管人员地位增强的因素正是资本主义制度

^① 皮凯蒂的书中包含大量的引文，但哈耶克的名字只在索引中出现过一次，而且不涉及此处提出的问题。该书没有提及熊彼特对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的伟大贡献，而是嘲讽地（尽管也算合理）评论了他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未来发展的错误预测。从书中我没有发现对激励问题的众多研究成果的借鉴。在研究该书的同时我还阅读了科兹威尔写的有关技术进步的名著（Kurzweil, 2006），他不是仅从技术史的角度来叙事，而是关注发明家和企业家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但丝毫没有提及技术进步背后的经济因素，其长篇索引中也没有包括“激励”一词。为什么一位研究分配问题的经济学家，与一位研究技术进步的 IT 人士都忽略了与其关注对象密切相关的激励问题，着实令我们不解。

^② 这个说法是来自经济心理学家 László Garai 对不平等问题的研究著作（Garai, 1990, 2015）。

的内在特征。然而在所有权结构之外，通常的劳动力市场效应依然在产生影响。高层经理人可以获得更高的薪酬，是因为有市场需求。对任何集中度的股权结构来说，给予高层经理人很高薪酬都是符合股东自身利益的。

某些学者怀疑有某个精确指标能显示世界各国的高层经理人的待遇都处于上涨趋势。对这方面的测算争论，我感觉自己没有充足的信息进行判断。至于在测算数据的解释上，我认为卡普兰等人的观点较为可信，正如其文章标题所言：“高级人才的回报广泛提升：是因为市场”（Kaplan and Rauh, 2013b）。^①

（2）激励→努力→不平等。每个人都知道，钱不是促进业绩的唯一动力，杰出成就还来自声誉和赞赏等激励机制（Garai, 1990, 2015）。苹果公司的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是真正的狂热分子，在各类新产品上都醉心于争取第一，执着于使所有产品都不断超越历史，并推出真正优美的设计（Isaacson, 2011）。除利益回报外，完成出色工作的喜悦和利他主义的动机也能产生强大激励。^②可是，承认激励的多元化，并不意味着否认金钱、物质方面的激励的主导地位。资本主义企业总是在追求利润，个人也普遍希望有更多收入。

金钱的激励能促进业绩提高，但因人而异。这个简单的三段论给我们直接带来的结论是，货币激励是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原因之一。

竞争——包括各种形式的竞争，如体育比赛、学业竞赛、电影和音乐人的竞争等——鼓励人们付出更多努力，也必然导致回报的差异。这里说的回报概念包含声誉和激赏，而竞争的优胜者通常还会得到奖金。或者像奥斯卡奖那样，获奖者没有奖金，但这种声誉会带来可观的票房收入与职业机遇。竞争鼓励人们努力奋斗的一个心理机制恰恰是奖励的差异性，如果机遇和结果都完全相同，每个人都能获得金牌，那还有什么必要开展竞争呢？竞争还需要有输家，甚至有些人哪怕获得银牌或铜牌，仍然会认为自己是个悲剧。

在商业竞争上，每个市场的角逐都会导致收入差距，最成功的企业赚到大钱，失败者遭受惨痛打击。失败的企业不但意味着其股东的损失，也会给无法获得贷款的中小型供货商以及失去工作的员工造成消极影响。跑步成绩用秒表

^① 这里需要考虑“人力资本”的创造和回报。此概念不同于皮凯蒂采用的框架，如果“资本”和“劳动”能被加总，它们各自的某些关键属性就会消失。

^② 参见：Garai（1990, 2015）。特定的激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还有的研究关注了成功的企业家具有哪些典型特征的问题（Caliendo and Kritikos, 2012；Cross and Travaglione, 2003）。

测算，举重成绩用重量测算，对于谁取得胜利没有太多争议。但商业竞争中获得胜利的正当性却可能存在疑问，而失败可能很冤枉，这个竞技场未必有充分的公正。然而激励作用是无可替代的，竞争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活力的最主要源泉之一。

有关不同市场结构——各种垄断、双头垄断、寡头垄断、可竞争市场、完全竞争市场——如何影响创新过程的理论争议远未结束。政府干预是促进还是阻碍了技术进步（Stiglitz and Greenwald, 2014）？现行的专利法制度是有益还是有害（Lybecker, 2014）？许多质疑言之有理：如现实的市场运行结构是不是最好的选择？然而，所有参与争论的学者都承认竞争产生的强烈激励作用。

近年来除了基于逻辑推导的理论研究的蓬勃发展外，也出现了新兴的实证研究。如本文第3节所述，熊彼特所展望的场景得到了证实，最近数十年来有很大部分革命性创新是由追求利润的企业在相互竞争中完成的，其股东和经理人从中获得了巨大的财富。菲尔普斯对比了美国和欧洲国家的表现（Phelps, 2008），美国政府对市场的限制和干预不及欧洲国家那样普遍，美国的资本市场也更为灵活，这可能是美国经济更具创造力和活力的主要原因。

激励与努力及不平等之间的关联不是线性的。普斯卡什的足球队获得的收入翻番，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获胜场次也能翻番。但如果体育明星能持续获得很高回报，就会鼓励运动员做出惊人的表现。商业竞争的效果也因为回报分配的高度不平等而受到强化。杰出成就所带来的回报远远高于次等成就的回报，这会刺激大多数竞争参与者的努力程度。

(3) 不平等→激励。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现实，会让某些人感觉沮丧。他们可能会感觉在起点上就处于巨大劣势，而放弃参与竞赛。他们可能会认为没有希望取得优异成绩或者能显著提升自己的能力。还有人则受到鼓励采取行动，希望在社会阶梯上至少进步一两个阶梯，增加部分收入。最自信的人志向更为高远。许多创业家怀有各种憧憬：或许自己也能如偶像人物那样取得技术突破（Van Auken、Frey and Stephens, 2006；Bosma et al. , 2012）。选择过程中伴随着很多错误，但创新资本主义最终会把有天才和能力的人推到领先地位。从这个角度看，包括豪富人群的扩大等不平等现象有着促进发展的积极作用。这是个复杂的关联关系，因为激励作用不是来自现实存在的不平等和财

富，而是源于企业家们如何看待巨大成功的前景（可以参考 Xavier – Oliviera et al. , 2015）。

企业家在不确定情况下的决策

创新企业的开办数量远远超过最后成功的数量，成功的几率远远小于失败。冒险从事创新的企业家会在合适的政治、社会、经济和监管条件下突然成长起来，快速的技术进步需要特定的条件。

日常经验表明，冒险从事创新的企业家通常会高估自己的成功机遇，这正是承担风险的一个重要激励。这方面的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研究，可参考巴尔贝斯的研究（Barberis, 2013），该研究以股票市场的股权投资为例，很好地描述了本文要讨论的情形：“某人给自己测算了一个概率，一个很小的概率，如果股票出现小概率事件，或者说成为下一个谷歌，他就能赚很多钱。在测算概率的时候，他在决策中放大了小概率发生的可能性。”（Barberis, 2013, 第 612 页）^①

还有其他证据表明投资决策者对成功有过度乐观的倾向（Malmendier and Tate, 2005；Landier and Thesmar, 2009；Astebro et al. , 2014）。我想补充的是，这种乐观尽管有所夸大，却反映着创新所必需的勇气（或者鲁莽）。技术进步是个基于实验的过程，在革命性突破出现之前可能是成百上千次的失败（Kerr, Nanda and Rhodes – Kropf, 2014）。美国的一项调查发现，1996 年创立的公司有超过一半在 6 年内倒闭（Astebro et al. , 2014）。在承担起创业风险时，必须有对自己创意的自信乃至迷信。^②

自发性与自然倾向

以上的叙述并非精确构造的“理论”，并非理所当然的结果。从各种观察、统计测算、个人经历、典型事件、调查问题和其他印象中得到的图景各不相同，在许多方面不相一致。趋势和相反趋势往往同时出现。我不能也不愿意以某种“定律”的形式来总结描述的现象，因为它们有着丰富的多样性和自

① 概率分布的这个细小延伸部分被称为“尾部”。

② 感谢 Botond Köszegi 给我介绍这些文章和其他著作，包括“behavioral economics and psychology of incentives”（Kamenica, 2012），该文对这方面的研究做了综述，并给我留下了如下印象：许多研究是基于人为的实验室条件开展的心理实验，但也有现实生活中的实证观察，但主要是来自其他领域，如选举或者慈善捐助等。不幸的是，很难找到我所关注的实证研究成果：真正企业家做出的反应，以及他们的思考和决策过程。

发性。^①我的文章表达的观点是，资本主义有产生推动技术进步的创新者的自然倾向，有导致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制造豪富人群的自然倾向，有形成强烈激励机制的自然倾向。^②这三类自发产生的自然倾向与很多因素相连，并彼此作用。只分析其中一个或两个倾向，就难以深刻理解资本主义制度，因为它们作为共生产物不可分割地交织着。

到这里为止，我的思路还是限于实证研究角度，而没有为政府或企业的决策者提供建议。此类建议——在一本书或一篇文章的结论处提出政策启示或者措施——是许多研究激励机制的文献所关注的，但本文的目标并非提供此类结论，而是致力于回答下面的问题。创新在决定和改变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豪富人群的收入和财富的真正来源在哪里？现实生活中起作用的激励机制有哪些？在回答这些问题时，我提到了许多有吸引力、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欢乐、有趣和令人激动的现象，也提到了许多令人厌恶、不符合我的正义感、悲惨和危险的现象。在总结“激励→努力→不平等”这个三角机制时，我只是简单提及了自己的价值判断，重点依然放在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上。

5. 矛盾、困境与行动计划

皮凯蒂认为资本主义面临着“基本矛盾”：“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经济学家们已普遍关注到 $r > g$ 这个简单公式”（Piketty, 2014, 第 571—573 页）。关于这个公式是否成立引发了许多讨论，它是在普遍条件下成立，还是在特定时期的特殊条件下成立？本文不想加入这个讨论。在我看来，这个问题要想取得较为满意的回答，主要办法应该是对有不同政治和经济结构的许多国家进行综合的历史比较分析。

在介绍我的思路之前，需要做些概念上的澄清。在第一步，我暂不讨论各种价值观之间的矛盾，而是用矛盾这个说法来泛指现实社会中各种势力、机制和倾向的冲突与不兼容。皮凯蒂把资本回报率高于增长率的现象称为矛盾，我

^① 按照不同标准来区别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历史实现形式，建立恰当的分类，在我看来是有益和重要的。这方面的成果可参考 Hall and Soskice (2001), Baumol, Litan and Schramm (2007)。承认这类研究项目的重要性，与本文所关注的各类资本主义的共性，并不存在矛盾。

^② 社会主义制度在诞生之初是强加给社会的。但在制度获得巩固，人们的行为模式形成后，这个制度也会出现内在的发展倾向性。

对此并无意见。令我不能苟同的是对其属性的判断，因为皮凯蒂宣布这个现象是所谓的“基本”矛盾。任何理论如果从若干矛盾中选出一个来作为主要矛盾，我都会保持怀疑态度。要找出其他也具有强烈影响力和系统特征（在别的系统下并不成立或者影响不大）的矛盾，似乎并不困难。

我本人则主张更为低调的做法，我甚至不会去考虑寻找资本主义的所谓基本矛盾，因为所有的现实制度都充满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在研究某些领域时，能找到其中最典型的一些矛盾就可以令我满意。本文的做法也是如此，我只是把技术进步、不平等和激励机制这三个倾向视为资本主义的内在特征，并不否认其他矛盾还广泛存在。

我不打算在这里就资本主义本质的描述应该采用单数还是复数挑起学术争论。但两种做法在道德和政治上有着不同却重要的影响。

马克思的《资本论》对资本主义做了扭曲的描述，他宣布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冲突是一种基本矛盾，然后从中得出了逻辑上很严密的结论。马克思是位革命者，既然冲突不可调和，落后的生产关系就必须被摧毁，并用完全不同的形式取而代之。

皮凯蒂不是革命者，他接受资本主义制度，但希望加以改造。然而他的著作也给这个制度做了片面、扭曲的描述。这种扭曲不在于他所描写的内容（其中确实有很多见地），而在于他所忽略的内容，或者稍有提及、没有足够重视的内容。他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活力、竞争的激励作用、技术进步及其对当今人类生活各方面的巨大影响都没有涉及。

这种扭曲的描述会导致错误的价值判断。全面而冷静的价值判断只能来自于全面而冷静的实际描述。在我心中，资本主义既非魔鬼，也不是天使，社会主义也同样如此。这两种制度的主要特征中都有令人向往和令人厌恶的地方。东欧国家的后社会主义转轨过程很敏感地展示了这个多样性的图景，人们既为获得政治选择权感到高兴，又痛恨政治权力与商业集团的勾结。高速的技术进步不但使创新者快速致富，也给寡头积累了大量金钱，他们凭借政治人脉捞取了大量国有资产和政府合同。

如果要我来做得失判断，我的价值观意味着对 1989—1990 年的转折以及此后向资本主义转轨表示欢呼，这主要来自两方面的理由。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东欧国家的所有权和经济协调机制转轨的同时，政府的组织形式也在发生变化，从一党制走向多党制，从集权统治走向自

由民主制。如果公有制依然占据主导，中央计划体制依然是主要的经济协调机制，后者是不可能实现的，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现代民主国家。但不幸的是，资本主义是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却非充分条件。^①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也进入了俄罗斯和中国，但它们并未建立民主政治。在东欧国家，至少是存在民主政治的可能性的，这本身就足以使我成为资本主义的信徒。

其次，本文高度重视资本主义制度的活力、技术进步成就及其给我们带来的数量和质量的生动力进步的好处。我并不否认资本主义内在倾向中的不足和危险之处，但我认为其成就是更为主要的方面。

此外我同样重视其他价值观。人人平等、社会正义、个人自由与自主权、宽容和开放、对弱势人群的团结救助，以及用和平手段来取代军事、肢体和心理上的暴力等，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几个方面。我知道这些多元化的价值观之间存在冲突，我不能也不打算对它们的相对地位做严格的排列权衡，我接受这些冲突带来的痛苦。^②

上述几段中频繁采用第一人称的阐述，并非是出于我的自我中心主义。我想谈论的是比理性思维更深层的精神感受，这只能通过自省来分类。只有狂热分子能够在价值观选择中保持一致性，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和斗争是人类的道德生活的组成部分。

在本文中之所以做以上的个人陈述，是因为皮凯蒂是用诚恳的人性化方式在写作，没有回避主观的情感，马克思在这方面同样是典范。但我认为与这本重要著作不相称的是，它过于匆忙地执着于一种价值观，即平等和社会正义，而忽略了其他价值观。

该书对资本主义的实证描述及其在价值判断上的倾向性，对其草拟的本已狭窄的行动计划产生了影响。皮凯蒂主张的财政改革，包括累进性质的（或者说比现有制度累进性更强的）所得税、提高对财富和继承的税收等，我都不反对。可是在表达支持之前，我希望就这些改革会给特定国家带来怎样的短

① 很遗憾，由于篇幅问题本文并没有讨论资本主义制度与政府组织形式（民主、专制或独裁）的关系，以及它们同收入分配的联系。当然我会对皮凯蒂书中的相关内容发表评论。

② 我在35年前做的一个研究（Kornai, 1980）是关于效率要求同社会主义的平等团结精神的矛盾。我的一本书名为《矛盾与困境》（*Contradictions and Dilemmas*, 1986），另一本是《新旧矛盾与困境》（*Old and New Contradictions and Dilemmas*, 1989）——这里是指最早的匈牙利文的书名，1990年翻译出版的英文版采用了另外的书名。

期和长期影响进行全面的研究。我不相信有放之四海皆能有效的良方。

那么，这些建议是解决资本主义的重大矛盾的关键吗？任务恐怕要复杂得多，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办法也不一样。离开短期和长期的多维度综合改革计划，单一的局部改革其实是难以奏效的。要克服各种不利因素、约束资本主义的本质倾向并减轻其消极影响，需要进行许多方面的改变，有些应快速行动，也有些需要宽松和逐步的实施。某些研究已令人信服地指出，在一个国家面临正确道路或错误道路的历史关头，是走向停滞、衰落还是进步，包括政府决策在内的许多因素会共同发挥作用（Acemoglu and Robinson, 2012）。

这些重大决策主要是在政治领域做出，^①它意味着在民主政治环境中，需要在现有的权力结构下到政治竞技场中去为好的决策争取支持。希望推行自己政治主张的人，必须利用好政治竞技场上现成的武器，而这些武器与学者们手里的工具往往不同。科学家们是以客观、公正和怀疑精神而著称。真正高明的政治家们则善于向支持者传递可以转化为行动的信念。同一个人能很好地分饰这两种角色吗？

皮凯蒂很勇敢地同时扮演了这两个角色。除其他因素外，或许正是因为他的偏执、不加疑虑和自信精神，才带来了巨大的成功。成千上万的读者在焦急地期待一部巨著，能明确告诉他们哪里出了问题，必须采取何种行动。而一本充满“一方面……另一方面”句式的作品，或者反映出作者对复杂的两难问题也并无把握的作品，是无法获得那样大的群众感召力的。也正是出于这些考虑，我才不带任何自欺奢望地给诸位献上关于皮凯蒂著作的读书笔记。

（余江 译）

参考文献

Acemoglu, D. and Robinson, J. A. (2012),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Crown Publishers.

Aghion, P., Bloom, N., Blundell, R., Griffith, R. and Howitt, P. (2005), “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 An Inverted U Relationship,”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0 (2), 701 -

^① 皮凯蒂的意见在远离政治的学术讨论中并未引起太多关注，而主要是在政治斗争中被提起。他的主张被写上政治旗帜，其政策建议也被特定的政治势力所采纳。我认为，从当今政治生活的角度对该书进行分析也是很有价值的，但这个任务留待他人去完成吧。

728, downloadable at <http://www.nber.org/papers/w9269.pdf>

Aghion, P. and Howitt, P. (1998),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Astebro, T., Hertz, H., Nanda, R. and Weber, R. A. (2014), "Seeking the Roots of Entrepreneurship: Insights from Behavioral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8 (3), 49 – 70, <http://dx.doi.org/10.1257/jep.28.3.49>.

Atkinson, A. B. (1997), "Bringing Income Distribution in From the Cold," *Economic Journal* 107 (441), 297 – 321, <http://dx.doi.org/10.1111/j.0013-0133.1997.159.x>.

Atkinson, A. B., Bourguignon, F., eds. (2015), *Handbook of Income Distribution*, Vol. 2, North Holland, New York: Elsevier.

Atkinson, A. B. and Micklewright, J. (1992),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arberis, N. (2013), "Psychology of Tail Events: Progress and Challeng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 (3), 611 – 616, <http://dx.doi.org/10.1257/aer.103.3.611>.

Baumol, W. J., Litan, R. E. and Schramm, C. J. (2007), *Good Capitalism, Bad Capitalism, and the Economics of Growth and Prosperity*,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Bosma, N., Hessels, J., Schutjens, V., Van Praag, M. and Verheul, I. (2012), "Entrepreneurship and Role Models,"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33 (2), 410 – 424, <http://dx.doi.org/10.1016/j.joep.2011.03.004>.

Brock, D. C., ed. (2006), *Understanding Moore's Law: Four Decades of Innovation*, Philadelphia: Chemical Heritage Press.

Caliendo, M. and Kritikos, A. S. (2012), "Searching for the Entrepreneurial Personality: New Evidence and Avenues for Further Research,"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33 (2), 319 – 324, <http://dx.doi.org/10.1016/j.joep.2011.06.001>.

Cross, B. and Travaglione, A. (2003), "The Untold Story: Is the Entrepreneur of the 21st Century Defined by Emotional Intellig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11 (3), 221 – 228, <http://dx.doi.org/10.1108/eb028973>.

Flannery, R. (2014), "Internet Entrepreneurs Top New Forbes Ranking of China's Richest," *Forbes*, October 27. <http://www.forbes.com/sites/russellflannery/2014/10/27/the-web-giveth-and-taketh-away/>.

Fontevecchia, A. (2014), "The New Forbes 400 Self – Made Score: From Silver Spooners To Bootstrappers," *Forbes*, October 2, <http://www.forbes.com/sites/afontevecchia/2014/10/02/the-new-forbes-400-self-made-score-from-silver-spooners-to-bootstrappers/>.

Garai, L. (1990), "Kis pénz → kis foci?" *Egy gazdaságpszichológia megalapozása* ["Little Money → Little Soccer?" Laying the Foundation of an Economic Psychology], Budapest: Magyar Közgazdasági Társaság/Hungarian Economic Association.

Garai, L. (2015), *Egyáltalán, minek nekünk a gazdaságpszichológia?* [Why Do We Need Economic Psychology, Anyway?], Budapest: Napvilág.

Gates, B. (2015), "Why Inequality Matters," <http://www.gatesnotes.com/Books/Why-Inequality-Matters-Capital-in-21st-Century-Review>.

Hall, P. A. and Soskice, D., eds. (2001),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Institutional Foun-*

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yek, F. A. , ed. (1935), *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Hengartner, L. (2006), *Explaining Executive Pay: The Roles of Managerial Power and Complexity*, Wiesbaden: Deutscher Universitätsverlag.

Hoffman, D. E. (2002), *The Oligarchs: Wealth and Power in the New Russia*,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Isaacson, W. (2011), *Steve Jobs*, Simon & Schuster.

Jensen, M. and Murphy, K. J. (1990), “Performance Pay and Top Management Incentiv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 (2), 225 – 264, <http://dx.doi.org/10.1086/261677>.

Kamenica, E. (2012), “Behavioral Economics and Psychology of Incentiv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 (13), 427 – 452, <http://dx.doi.org/10.1146/annurev-economics-080511-110909>.

Kaplan, S. N. and Rauh, J. D. (2013a), “Family, Education, and Sources of Wealth among the Richest Americans, 1982 – 2012,”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 (3), 158 – 162, <http://dx.doi.org/10.1257/aer.103.3.158>.

Kaplan, S. N. and Rauh, J. D. (2013b), “It’s the Market: The Broad – Based Rise in the Return to Top Talent,”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7 (3), 35 – 56, <http://dx.doi.org/10.1257/jep.27.3.35>.

Kerr, W. R. , Nanda, R. and Rhodes – Kropf, M. (2014), “Entrepreneurship as Experiment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8 (3), 25 – 48, <http://dx.doi.org/10.1257/jep.28.3.25>.

Kis, J. (2009a),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outline of a defense,” in *Resolv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liber amicorum Tibor Várady*, 187 – 196, CEU Press.

Kis, J. (2009b), “Constitutional Precommitment Revisited.” in *Journal of Social Philosophy* 40 (4), 570 – 597, <http://publications.ceu.edu/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2009constitutional-precommitment>.

Kis, J. (2014), “Mi a liberalizmus?” [What is Liberalism?] . An article in the author’s collection of essays bearing the same title, *Mi a liberalizmus? Esszék, tanulmányok 1985 – 2014*, 537 – 675. Bratislava/Budapest: Kalligram.

Kolosi, T. and Szelényi, I. (2010), *Hogyan legyünk milliárdosok? avagy A neoliberális etika és a posztkommunista kapitalizmus szelleme* [How to Become a Billionaire: Neoliberal Ethics and the Spirit of Postcommunist Capitalism], Budapest: Corvina.

Kornai, J. (1980), “The Dilemmas of a Socialist Economy: The Hungarian Experience,”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4 (2), 147 – 157.

Kornai, J. (1986), *Contradictions and Dilemmas: Studies on the Socialist Economy and Society*, Cambridge: MIT Press.

Kornai, J. (1989), *Régi és új ellentmondások és dilemmák* [Old and New Contradictions and Dilemmas], Budapest: Magvető.

Kornai, J. (1990), *Visions and Reality: Market and State*, Budapest – New York: Corvina – Routledge.

Kornai, J. (2009), "Marx through the Eyes of an East European Intellectual," *Social Research*, 76 (3), 965 – 986, <http://kornai-janos.hu/KORNAI2009%20Marx%20through%20the%20eyes%20-%20Social%20Research.pdf>. Translated by Brian McLean from the original Hungarian article "Marx egy kelet-európai értelmiségi szemével," *Mozgó Világ* 2008/12, 3 – 14.

Kornai, J. (2011), *Gondolatok a kapitalizmusról*, [Thoughts on Capitalism], Akadémiai Kiadó.

Kornai, János (2014), *Dynamism, Rivalry, and the Surplus Econom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ttp://dx.doi.org/10.1093/acprof:oso/9780199334766.001.0001>.

Kurzweil, R. (2006), *The Singularity Is Near: When Humans Transcend Biology*, Penguin Books.

Laki, M. and Szalai, J. (2004), *Vállalkozók vagy polgárok? A nagyvállalkozók gazdasági és társadalmi helyzetének ambivalenciái az ezredforduló Magyarorszáján* [Venturers or Bourgeois? Ambivalence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position of Hungary's big entrepreneurs in the new millennium]. Budapest: Osiris.

Laki, M. and Szalai, J. (2011), "Ten years after: Hungarian big entrepreneurs in the European Union," paper presented at SEBA – IE CASS – IEHAS Economics of Crisis, Education and Labour, Chinese – Hungari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30th June – 1st July, Budapest, <http://www.econ.core.hu/file/download/sebawsh/LAKI.pdf>.

Laki, M. and Szalai, J. (2013), *Tíz évvel később – magyar nagyvállalkozók európai környezetben* [Ten years after: Hungarian big entrepreneurs in the European Union].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Szemle Alapítvány.

Landier, A. and Thesmar, D. (2009), "Financial Contracting with Optimistic Entrepreneurs,"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2 (1), 117 – 150, <http://dx.doi.org/10.1093/rfs/hhn065>.

Lange, O. (1968 [1936 – 37]),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in B. E. Lippincott (ed.),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57 – 143. New York – Toronto – London: McGraw Hill.

Losoncz, A. (2015), "Marx Károly visszatért és újraírta a *Tőkét*" [Karl Marx has returned and rewritten Capital] posted to the "Szakirodalom" [recommended literature] blog at the Hungarian online portal for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Átlátszó.hu on July 1, <http://szakirodalom.atlatszo.hu/2015/07/01/marx-karoly-visszatert-es-ujrairta-a-toket>.

Lybecker, K. (2014), "Promoting Innovation: The Economics of Innovation," *IPWatchdog*, July 21, 2014, <http://www.ipwatchdog.com/2014/07/21/promoting-innovation-the-economics-of-incentives>.

Malmendier, U. and Tate, G. (2005), "CEO Overconfidence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Journal of Finance* 9 (6), 2661 – 2700, <http://dx.doi.org/10.1111/j.1540-6261.2005.00813.x>.

Marx, K. (1906 [1894]),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I: The Process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Chicago: Charles H. Kerr & Company.

Marx, K. (1907 [1867]),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II: The Process of Circulation of Capital*, Chicago: Charles H. Kerr & Company.

Marx, K. (1909 [1894]),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III: The Process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as a Whole*, Chicago: Charles H. Kerr & Company.

Marx, K. and Engels, F. (1973 [1848]),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Mehran, H. (1995), “Executive compensation structure, ownership, and firm performa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38 (2), 163 – 184, [http://dx.doi.org/10.1016/0304-405x\(94\)00809-f](http://dx.doi.org/10.1016/0304-405x(94)00809-f).

Milanovic, B. (2014), “The Return of ‘Patrimonial Capitalism’: A Review of Thomas Piketty’s *Capital in the Twenty – First Centur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52 (2), 519 – 534, <http://dx.doi.org/10.1257/jel.52.2.519>.

Mises, L. von (1935 [1920]), “Economic Calculations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 in F. A. Hayek (ed.), *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87 – 130,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Murphy, K. J. (1999), “Executive Compensation,” in O. Ashenfelter and D. Card (eds.), *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Vol. 3, Part B, 2485 – 2563, North Holland, New York: Elsevier, [http://dx.doi.org/doi:10.1016/S1573-4463\(99\)30024-9](http://dx.doi.org/doi:10.1016/S1573-4463(99)30024-9).

Phelps, E. S. (2008), “Understanding the Great Changes in the World: Gaining Ground and Losing Ground since World War II,” in J. Kornai, L. Mátyás and G. Roland (ed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Behaviour*, 77 – 98, Handmills – Basingstoke –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Piketty, T. (2013), *Le capital au XXI^e siècle*. Paris: Seuil.

Piketty, T. (2014), *Capital in the Twenty – First Century*, translated by Arthur Goldhammer,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Piketty, T. (2015a), *A tőke a 21. században [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 translated by Zsuzsanna Balogh – Sárközy, Budapest: Kossuth.

Piketty, T. (2015b), “Putting Distribution Back at the Center of Economics: Reflections on *Capital in the Twenty – First Centur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9 (1), 67 – 88, <http://piketty.pse.ens.fr/files/Piketty2015JEP.pdf>, <http://dx.doi.org/10.1257/jep.29.1.67>.

Piketty, T. (2015c), “A Practical Vision of a More Equal Society,”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62 (11) (June 25, 2015), 26 – 29,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archives/2015/jun/25/practical-vision-more-equal-society/>.

Piketty, T. and Saez, E. (2013), “Top Incomes and the Great Recession: Recent Evolution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IMF Economic Review* 61 (1), 456 – 478, <http://dx.doi.org/10.1057/imfer.2013.14>.

Prendergast, C. (1999), “The Provision of Incentives in Firm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7 (1), 7 – 63, <http://dx.doi.org/10.1257/jel.37.1.7>.

Rawls, J. (1971),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ay, D. (2015), “Nit – Piketty: A Comment on Thomas Piketty’s *Capital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CESifo Forum* 16 (1), 19 – 25, <http://www.cesifo-group.de/DocDL/forum1-15-focus3.pdf>.

Schumpeter, J. A. (2008 [1934]),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ts, Capital, Credit, 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 Transaction Publishers.

Sen, A. K. (1985), *Commodities and Capabilities*, Oxford: Elsevier.

Stiglitz, J. E. and Greenwald, B. C. (2014), *Creating a Learning Socie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Tóth, I. G. (2014), "Revisiting Grand Narratives of Growing Income Inequalities: Lessons from 30 Country Studies," in B. Nolan, W. Salverda, D. Checchi, I. Marx, A. McKnight, I. G. Tóth and H. G. van de Werfhorst, *Changing Inequalities and Societal Impacts in Rich Countries: Thirty Countries' Experienc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1 – 47, <http://dx.doi.org/10.1093/acprof:oso/9780199687428.003.0002>.

Tóth, I. G. and Medgyesi, M. (2011), "Income Distribution in New (and Old) EU Member States," *Corvinus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Policy* 6 (1), 3 – 33, <http://dx.doi.org/10.14267/issn.2062-087X>.

Van Auken, H., Fry, F. L. and Stephens, P. (2006), "The Influence of Role Models o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Entrepreneurship* 11 (2), 157 – 167, <http://dx.doi.org/10.1142/s1084946706000349>.

Xavier – Oliveira, E., Laplume, A. O. and Pathak, S. (2015), "What Motivates Entrepreneurial Entry under Economic Inequality? The Role of Human and Financial Capital," *Human Relations* 68 (7), 1183 – 1207, <http://dx.doi.org/10.1177/0018726715578200>.